

《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 及其匿名編者蕭輝楷先生考

劉宇光*

摘要

中共治下七十餘年中國佛教的經歷以 1950-1970 年代的變化最劇烈迅猛，但可供研究的資料甚缺乏，能夠將這階段佛教情況匯編並公開出版的，是冷戰高峰時期 1968 年英治香港兩個最主要佛教組織的僧侶領袖撰〈序〉並負責的《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它是篇幅近六百頁，四十五萬字的資料彙編，約 90% 內容屬中共的佛教相關文件。即使超過半個世紀，《彙編》迄今仍然是 1950-1960 年代中共治下佛教情況的最充實資料匯集，只是學界對此的理解和討論皆甚有限。本文由兩節組成，壹是對《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內容的分析；貳是考察《彙編》匿名編者蕭輝楷先生包括他與臺灣佛教之間關係等的生平經歷，並分析蕭氏的政治、宗教暨學術態度，最後的結論則埋下讓議題進入另一臺階和視野之伏筆。

關鍵詞：蕭輝楷、《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友聯社、香港佛教、文化冷戰

*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客座副研究員

***Sourcebook on Buddhism in Mainland China
1949-1967 and its Anonymous Editor
Mr. Hwi-Kai Hsiao***

Lawrence Y.K. L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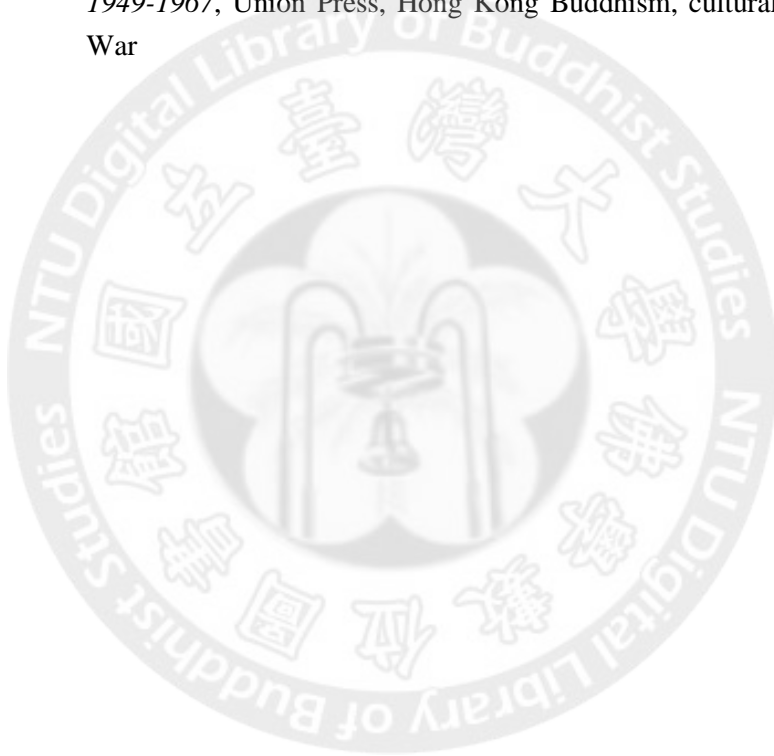
Abstract

During the seven decades unde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s Regime since 1949, Chinese Buddhism had gone through its most difficult period with rapid changing of 1950-1970's. But the primary sources of this period are extremely rare that hardly to have research able be carried out. So far only the *Sourcebook on Buddhism in Mainland China 1949-1967* was published in 1968. It is compiled by Hong Kong Buddhist Association and Hong Kong Buddhist Sangha Association, which are the mainstream Buddhist organizations of the British colony during the peak period of the Cold War, along with the Preface for the volume prepared by the monastic leader of two organizations. The Sourcebook has nearly 600 pages, with 450,000 characters, while up to 90% of its content is CCP's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s about Buddhism in China. Thus, although the studies on it are limited, but i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materials of the period. The article is composed of two sections. Firstly, a concise analysis on the content of the volume. Secondly, description on the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connection with Taiwan and Buddhism of Hwi-Kai Hsiao, the anonymous editor of the *Sourcebook*. Further explanation of Hsiao's mentalities on politics, religion (Buddhism) and scholarship will be carried out as well. The

* Visiti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nclusion is a prolegomena for the further analysis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sult achieved by the present article with relocating the issue in a new horizon.

Keywords: Hwi-Kai Hsiao, *Sourcebook on Buddhism in Mainland China 1949-1967*, Union Press, Hong Kong Buddhism, cultural Cold War



一、前言

1949 年 10 月中國的政權從國民黨易手為共產黨，迄今七十餘年，中共治下的佛教所經歷的數輪大起大落，其反差之巨罕見於世。唯中國學界對此基本上噤若寒蟬，西方學界亦是到最近二十年才開始有機會研究中共治下佛教的變化，且其題材多涉 1990 年代之後而罕及此前的情況，侃乎目前研究成績規模仍甚有限。與此相比，對於變化最為廣泛而劇烈迅猛的 1950-1970 年代的三十年間，由於年代久遠，相關原始資料因諸多原因而散佚不存，大量當年親歷劇變的過來人逐漸作古，瞭解更為模糊不清。而能夠將中共治下最早階段的佛教變化的部份情況匯編為資料集公開出版的，反而是在英治香港。當時全世界處在冷戰高峰時期，香港更是亞洲冷戰的最前線地點之一，其角色在東亞伸延到東南亞華文世界的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領域尤為重要，而宗教是其中容易被忽視或低估的範疇，下來的討論即以佛教為主要案例。

香港佛教當年兩個最主要的組織在 1968 年公開出版了題為《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下簡稱《彙編》），篇幅近 580 頁，45 萬字的資料彙編，當中收納了中共統治後最初約 17 年佛教情況的資訊。即使過了超過半個世紀，《彙編》迄今仍然是有關 1950-1960 年代中共治下佛教情況的最完整資料匯集。整部《彙編》從搜集、匯編、分題、評論和導言、印刷及出版發行皆不是簡單的事，不單背後的撰〈序〉者和匿名執行主編的身份、印刷和出版機構的背景皆有特殊意義，且更涉及冷戰時期複雜的宏觀國際政治環境，只是目前學界對此的討論皆甚有限。本文是筆者探討此一議題系列論文的第一篇，主要是有關《彙編》的內容特點及考證其匿名編者的真實身份，後續的論文才再以這考證所得的結論為基礎，將問題推進往另一層脈絡，本文

由兩節組成，壹「《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半個世紀後的回眸」是對其內容的綜合分析；貳「蕭輝楷先生：《彙編》隱姓埋名半世紀的匿名主編考」，分析蕭氏的生平外，亦兼論其政治、宗教暨學術態度，最後的結論則埋下讓議題進入另一臺階和視野之伏筆。

二、《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半個世紀後的回眸

本節是對 1968 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共佛教資料匯編的扼述，並為下一節考證其匿名編者作準備。這資料集題為《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英文書題是 *Sourcebook on Buddhism in Mainland China 1949-1967*，由香港佛教聯合會（Hong Kong Buddhist Association，下簡稱「佛聯會」）和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Hong Kong Buddhist Sangha Association，下簡稱「僧伽會」）合編，並由上述兩會的共同領袖釋覺光撰〈序〉，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

基本資料：《彙編》全書內容分為八個主題，分別是一「中共的宗教政策」¹、二「中共政權成立初期的佛教」²、三「中國佛教協會」³、四「大陸佛教徒的活動」⁴、五「大陸佛教的典章文物」⁵、六「大陸佛

¹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佛教僧伽聯合編，釋覺光序，《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香港：友聯出版社，1968 年，頁 3-88。下註簡稱《彙編》。

² 《彙編》，頁 89-116。

³ 《彙編》，頁 119-186。

⁴ 《彙編》，頁 187-326。

⁵ 《彙編》，頁 327-352。

教的教育研究及出版工作」⁶、七「大陸佛教徒生活情況」⁷、八「西藏喇嘛教的情況」⁸，及兩項附錄⁹。這八部包括 24 章和 43 節，共 557 頁，實質的篇幅分佈並不平均，一章由 3 頁到 60 頁不等。

《彙編》是資料匯編，並非研究論集或專著，全書總篇幅約 45 萬字，引用文件約 40 萬字，主編的文字說明約 5 萬字，只佔篇幅的 11%，收納文件佔全書總篇幅約 89%。《彙編》收納的中共佛教政策相關文件共 232 件，介乎 1950 年和 1967 年的 17 年間，分別來自從中央到省級報紙和黨政或學術刊物約 35 種¹⁰，其中引用最廣的是中國新聞通訊 42 次、《人民日報》50 次、北京《光明日報》31 次及香港的《文匯報》與《大公報》43 次，合共 166 次，這數項主要來源的總和佔收納文件總數約 72%，大幅拋離餘下的其他來源，另偶有少數來自法例或會議公告的文字轉載。另上述報刊皆不是佛教專題，唯一引述的佛教刊物是《現代佛學》，共九次¹¹。從今天角度來看，《彙編》所收文件幾乎全都是

⁶ 《彙編》，頁 353-427。

⁷ 《彙編》，頁 429-469。

⁸ 《彙編》，頁 473-541。

⁹ 《彙編》，附頁 1-16。

¹⁰ 收納報導所來自的媒體有中國新聞通訊、北京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及《大公報》；上海的《解放日報》、《文匯報》及《新聞日報》；此外《甘肅日報》、《青海日報》、《福建日報》、武漢《長江日報》、《南京日報》、《雲南日報》、《四川日報》、《成都日報》、《新蘇州報》、《浙江日報》、《湖北日報》、《廣西日報》、廣州《羊城晚報》和《南方日報》、重慶《大公報》、《遼寧日報》、《瀋陽日報》、香港《大公報》和《文匯報》。刊物則包括《紅與專》、《紅旗雜誌》、《新華月刊》、《民族研究》、《民族團結》及《現代佛學》。

¹¹ 《彙編》收《現代佛學》，文字見頁 260-268，269-270，271-278，290-293，294-295，296-301，302-305，305-306，419-420，共 36 頁，佔全集篇幅不高，

所謂「公開」的媒體文字，似無甚秘密可言。但需要考慮 1950-60 年代資訊流通遠非今日可比，加上共產中國竹幕鎖國，即使是中國國內公開的文字報導亦甚有限，並受嚴密控制，而且中國幅員廣大，消息罕傳於境外，故此對 1960 年代後期的中國境外而言，《彙編》提供的資料仍然甚為重要。

雖然難以精確判斷收集在《彙編》的文件到底佔當時發佈的佛教報導總量的百分比，但可約略說起碼就國家政策層面的主要佛教議題，多已包括在當中。在馬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高漲，且一波接一波政治整肅運動連續不斷的整個 1950-1960 年代，宗教從來都是被嚴厲針對的重點目標之一。所有媒體皆受官方徹底支配與掌握之情況下，並不會出現自由社會的媒體上常見的宗教社群、活動及節日的一般消息與報導，當時中國媒體上偶涉宗教的議題，無論是正面或反面，絕大部份都只是為了中共政權本身或內或外的政治需要，而非關宗教社群本身的生活、信仰或文化之需要。所以儘管《彙編》在搜集與選材上確有其特定傾向（見下文說明），但會否因而有很大偏頗，遺漏中共佛教其他重要議題的材料，並造成重大誤導，這是暫未明顯見到。反之，《彙編》仍然偶有收納好些無論當初出於什麼考量，而對佛教文化作出了雅緻而尚見溫和的詳細文字報導。雖然《彙編》有其本身複雜的章節標題與內容安排，但綜合來說，它收納的文件所涉主題反映它是由幾項幾乎是標誌性的主軸

其主題集中在佛教外交上，發言者皆中國佛教協會的官方人物趙樸初和喜饒嘉措。《現代佛學》為中國佛教協會所發行，創刊於 1953 年 1 月至 1964 年 12 月停刊，前後 11 年，反映官方的佛教政策及佛教的動向。審評者 A 提醒筆者注意《現代佛學》，並作出扼要說明筆者在此據其建議稍作梳理，特此感謝審評者 A。

議題組成，這些基礎為中共往後對中國佛教的好些政治屬性劃下了標準與定義。

首先，「中國佛教」的政治定義。據《彙編》所收文件充份證明，對中共而言「中國佛教」一詞的理解與使用方式從 1950 年代建政開始，就是清楚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版圖內的所有佛教」，無論其傳統、語文及族群是什麼。此一規定沿用迄今，對「中國佛教」的這種政治定義並非新近提出的觀念，卻是非常一貫地使用了超過 70 年。它除了指漢傳佛教外，明確包括藏傳佛教和雲南傣族的上座部佛教，這是個帶有政治甚至特定政權烙印的界定¹²，不單與文化傳統無關，其一貫而明確的程度超過在文化觀上尚多少受傳統華夷之辨影響的民國階段，遑論清帝國時期。它也與人文學科和佛教學術界使用「中國佛教」一詞時指傳統文化意義的中國所引伸的「漢傳佛教」無關，兩者差別甚大，不能混淆，¹³ 這基本上是以現代政治版圖概念，取代並排除基於文化所作的既有學術定義，目的只在表明西藏和雲南均是中國一部份。

第二，《彙編》開宗明義即用上近 90 頁（頁 3-90，佔全書篇幅 16%）設立專題，匯編了 1950-1960 年代中共內部據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對宗教在階級鬥爭中的屬性問題之學理爭論，這並非學院內的純學術爭論，卻是意識形態上的路線鬥爭，直接涉及政策方針乃至對社會具體政治衝擊的極端與徹底程度。簡單說，在共產中

¹² 《彙編》，頁 132-135，138-151。

¹³ 無論是有心或無意，這當中政權版圖和人文學科對「中國佛教」概念的雙重標準其實存在微妙的政治含義，造成既能在佛教案例上展現中共政治版圖的「完整」樣態，但同時又以佛教為例，暗示漢文化才是主體。但這種以漢文化為中心的大一統意像在佛教身上尤顯突兀，畢竟無論藏傳和上座部的佛教文明皆不會弱於漢傳。

國建立後，「舊社會」殘留下來的宗教傳統應該是單純透過持續的「教育」來從思想上逐漸清除之，還是需要將宗教議題提升到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不可分的一環之高度來看待之。

《彙編》收列這個議題中共內部的溫和與激進兩陣的文件，其間的差異遠非只是手段緩急之別，卻是關乎有否在意識形態的高度上準確而徹底地落實馬列主義的宗教觀和政策路線，所以在共產中國的宗教信徒其屬性到底只是單純的「落後份子」，因而可予耐性容忍和循循教導，還是更為危險與可憎的「反動份子」，甚而是潛伏著的階級敵人伺機復辟，因而應予無情消滅，二者之間此一分歧遂成為爭論之焦點，主張單純以教育作漸進的思想改變的一方，被其黨內同志嚴辭指控為完全背離馬列主義軌道，是在美化宗教並危及對宗教應該進行階級鬥爭之大方向的明確性。¹⁴

此外《彙編》尚進一步更細緻地討論到雖然所有宗教概屬反動落後和帶有欺騙性，但不同宗教的反動角色各有差異，必須作出區分，西方宗教與帝國殖民主義關係密切，漢傳佛教和道教與封建主義相關，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則涉及潛在政治分裂的地方民族主義和封建主義，其為禍的途徑與方式各異，連帶在政治上應對的反制方法亦各不相同，所以不能含糊地混為一談。¹⁵ 1950 年代創立的這一區分影響非常深遠，即使到事隔七十餘年的今天，對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政策層面，如何面對國內、外的所謂宗教問題，仍然起著原則性的指導作用，尤其在最近十年更為明顯。

中共從 1990-2000 年代江朱、胡溫任內的二十年間相對溫和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到 2013 年迄今，中共宗教政策大幅退回政治

¹⁴ 《彙編》，頁 3-59，66-86。

¹⁵ 《彙編》，頁 215-217，279-292。

意識形態先行的狀態，再度重新強調不同宗教與不同政治威脅之間的關係，基督宗教涉西方顛覆、藏傳佛教涉分裂主義，及伊斯蘭教涉宗教極端甚至恐怖主義，不同宗教之間在政治威脅上的「分工」，¹⁶ 雖然在內容上有 2010 年代的部份時事效應，所以漢傳佛教與道教的涉封建主義則被降溫，以為漢傳佛教等負起對臺港和東南亞華人社會，乃至對東南亞暨南亞的上座部佛教的統一戰線任務開路，¹⁷ 但其框架的淵源，卻是直溯 1950 年代所定下的基礎。

除此之外，《彙編》還收列中共內部對以下宗教相關議題的討論：一，宗教與「唯心主義」和「迷信」之間有否本質上的差異；¹⁸ 二，宗教與少數民族兩個議題之間的開合；¹⁹ 三，在馬列主義從「革命」到建立政權推進過程的不同階段，對宗教作為政治工具之功能有不同的預期

¹⁶ 徐以驊等著，《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 年 6 月），散見全書多處，尤其徐以驊著導論章〈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頁 1-22）；章沅著第二章〈宗教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路徑與範式〉（頁 60-76）；中篇〈宗教安全現狀與趨勢〉內涉及宗教恐怖主義、國際宗教非政府組織、基督宗教傳教運動，及兩岸關係下的宗教之範疇與國家安全之間關係的第五到第八共四章（頁 155-288）；下篇〈宗教與中國對外戰略〉全文第九到第十一共三章（頁 289-346）。

¹⁷ 對中國學界此一觀點的整理及批評，見劉宇光著，《僧侶與公僕：泰系上座部佛教僧團教育的現代曲折》（陳劍煌編，《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3 年 1 月）的整個單元二〈當代雲南傣族上座部佛教的毀滅與重生：兼與「戰略意義」說商榷〉，頁 311-412，尤其整理見頁 313-320，批評見頁 404-412。

¹⁸ 《彙編》，頁 34-47，55-65，79-87。

¹⁹ 《彙編》，頁 8。

與要求；²⁰ 及四，在階級鬥爭上，如何區分與宗教內「進步份子」之間形成的「統戰」關係是建基在策略性的政治需要上，而不是價值觀念的共識上，必須警惕其終究的分歧與局限。²¹

第三，中國佛教的政治清洗。時下常誤解 1949 年後中國的佛教是毀於 1967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但據《彙編》所收錄的文件與報導，1950-1952 年間土地改革所執行的強硬政策，已經沒收了絕大部份漢傳寺院的土地田產，所以漢傳僧團在 1950 年代中在巨大壓力下已瀕臨全體崩潰的邊緣。²² 雲南傣族上座部佛教寺院亦經歷類似劇變，最終導致部份僧、俗傣族流亡海外。²³ 雖然純粹出於統治策略上的考慮，藏傳佛教在 1950 年代中期階段在表面上暫時未直接發生劇變，儘管壓力已日趨迫近爆發衝突的臨界點。

第四，宗教的內外有別（頁 214-328，附頁 1-14）。1950 年代是中國國內從生存的經濟基礎上，清除宗教執行得最嚴厲的階段。但 1950 年代中段卻同時也是中共最頻繁活躍地運用佛教作為對外政治手段，來發揮其國際影響力之階段。對一般國家，即使是政治獨裁者來說，其公共外交仍然多以有諸內形諸外為前提，但中共與此不同的是，厲行內外有別的政策，在鎖國情況下對內消滅佛教，與同時公開而高調地以佛教作為政權對外政治工具之間並不矛盾，²⁴ 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扮演此對外功能。1955-1957 年間頻繁派遣新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的漢、藏佛教代表造訪亞洲各國參與國際佛教活動，其中多次南亞

²⁰ 《彙編》，頁 24-29。

²¹ 《彙編》，頁 24-25。

²² 《彙編》，頁 91-118，153-156。

²³ 《彙編》，頁 132，207-208，212。

²⁴ 《彙編》，頁 119-123，257-328。

與東南亞的訪問，藏傳僧人的角色甚至超過漢傳僧人。在經歷 1957-1960 年「大躍進」造成全國大饑荒和 1959 年的西藏反抗後，1961-1964 年連續三年以鑑真大師圓寂 1200 年、玄奘大師圓寂 1300 年、越南僧人抗爭紀念等為主題，²⁵ 在中國舉辦國際佛教活動。此外，《彙編》的主編在附錄〈中共「佛教工作」面面觀〉裡，對中共為何與如何在諸多宗教中，選擇以佛教作為對外的主要政治性宗教工具及其複雜性作出綜合分析。²⁶ 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直接影響在文革之後的 1980 年代以東亞為主要目標，及 2000 年代以來的廿餘年間，幾乎是全方位的大規模佛教公共外交。

第五，佛教的歷史文物化（頁 329-391，419-430）。基於內外有別的宗教政策，佛教仍然具有作為意識形態的歷史教材和現實的對外政治用途，所以對其硬件部份如寺院的建築與古蹟、文物等物質遺產方面，儘管政權投入一定的資源作修繕與維護，但完全迴避甚至壓抑其文化、價值觀及宗教上的意義，²⁷ 其中的關鍵是從文化與價值內容上壓制宗教專業的建立和宗教思想的學術研究，所以中共只需要文物化的「死佛教」，不是以人為載體的「活佛教」，²⁸ 而這與前文所述將宗教思想放在階級鬥爭脈絡，來解讀唯心與唯物主義的思想爭論相互呼應。²⁹

²⁵ 《彙編》，頁 231-256。

²⁶ 《彙編》，頁附 1-14。

²⁷ 《彙編》，頁 329-354。

²⁸ 《彙編》，頁 355-368。

²⁹ 純從當代中國的佛教學術史來說，一個甲子前種下的此一扭曲與損害即使經過近三十年相對寬鬆的研究環境，迄今仍然未能復原過來，但這是另一個議題，不在此冗述，見劉宇光綜合分析，〈一個徘徊在中國學院佛學研究上空的幽靈〉，趙文宗和劉宇光合編，《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文集》，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2 年 11 月，頁 24-65。

第六，藏傳佛教（專題是頁 473-541，另散見其他章節多處）。《彙編》透過收納的文件要集中呈現的特點，是 1959 年中共與藏族爆發公開的軍事衝突之前與之後，因應於中共政權的需要，中國媒體透過文字對藏族的社會、佛教，及文化所作的論述截然相反，衝突前言辭客氣，之後卻不單充滿敵意，且語言極端地將藏文化說得一無是處。這種從白而黑的天壤之別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突然翻轉，《彙編》提供了呈現此一尖銳反差的系列文件以作證明。³⁰

第七，越南佛教僧侶自焚事件。1960 年代越南在美蘇冷戰對峙的背景下成為東南亞主要的熱戰戰場之一，越南本身依國際兩陣營的軍政勢力和意識形態立場，分裂為南、北兩個政權或國家，即南越和北越，前者親西方尤其美國；後者是共產政權，親蘇聯與中共，雙方均獲背後大國從經濟、政治到軍事的援助。1960 年代初的南越政府貪污腐敗，政要與官員濫權瀆職，且總統阮氏家族信仰天主教，持權勢公然壓迫與羞辱在越南甚具社會基礎的佛教，有僧侶因不堪受壓與受辱，在現代媒體前以公開自焚作抗爭，成為 1960 年代越南時局的標誌性政教事件，當年不同政治陣營或國家的佛教組織紛紛對此作回應。《彙編》收列同期的中國資料，說明中共的官方佛教對事件的態度，基本上是將越僧自焚的抗爭解讀為越南人民對「美吳集團」的政治抗爭，抗議帝國主義對越南的侵害與壓迫。³¹

若與當年臺灣、香港等華文「自由」地區，乃至冷戰西方陣營其他成員泰國等的佛教對事件的公開反應作對比，可以看到中共官方佛教對事件的獨特態度。臺北中國佛教會會長白聖法師無論在宗教、國際政治及私誼等因素上，皆與南越的主要佛教組織負責人，在宗教上有頗密切

³⁰ 《彙編》，頁 201-206，279-292，316-326，473-530。

³¹ 《彙編》，頁 293-306。

的公務往來。據 1990 年代出版的白聖日記所述，南越僧侶長期與白聖交流對 1960 年代越南政教時局之觀點，使白聖得出與後來社會大眾舉凡提及 1960 年代越南佛教，即聯想到僧侶自焚和年青時期一行禪師（Thích Nhất Hạnh, 1926-2022）等激進形像非常不同的理解。雖然後世常因前述事件，而視越南僧侶普遍積極投身政治暨宗教抗爭，但其實當時南越僧侶在面對官方的佛教措施時，起碼有激進抗爭和溫和抗議兩種主要立場，還發生激進派因不滿溫和派反應不夠強烈而衝擊對方道場作質詢之情況，³² 而在激進派南越僧人之間，有更明確屬同情共產主義的如釋善豪、釋智度等，卻在 1960 年代受邀赴中國參加由中共主辦，主要邀請共產陣營國家僧侶參加的佛教會議，並借越僧自焚發言反美，讓人好奇應如何理解激進派南越僧人的確切角色。³³ 雖然據釋煮雲與南越僧侶之間的通訊，溫和派領袖如心珠上座等最終仍然被官方拘捕囚禁及遭受酷刑。³⁴ 有意思的是白聖在面對越僧自焚等抗爭事件時是質詢為何激進越僧在官方領導全國抗共的生死存亡之際，在扯抗共事業的後腿。³⁵ 白聖顯然認為事情有緩急優次之分，宗教歧視相對於抗共應該知道輕重之分。

³² 釋白聖著，《白聖長老日記（二）》，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6 年春季，頁 113；《白聖長老日記（三）》，2005 年 11 月，頁 359-360；《白聖長老日記（四）》，2006 年 10 月，頁 215。

³³ 《彙編》，頁 293-306。

³⁴ 釋煮雲著，〈越南佛教領袖：心珠上座〉、〈釋心珠獄中寄書〉，及〈越南佛教遭劫的序幕〉，收於氏著，《東南亞佛教見聞記》，臺北：菩提樹雜誌社，1972 年，《一，越南佛教見聞記》的廿一到廿三項，即頁 42-50，後重刊於《煮雲法師全集》，高雄：鳳山佛教蓮社，1988 年。

³⁵ 釋白聖著，《白聖長老日記（一）》，2003 年秋季，頁 265。

與白聖代表的臺灣佛教官方組織持類似觀點的是泰國上座部僧團當局，泰國在現代東南亞暨南亞上座部，是在舉凡涉及政治或公共事務時，以保守和官僚威權性格聞名，故對僧侶的抗爭常持警惕態度，從而質疑越南激進僧侶的宗教抗爭是「殖民主義帶來的病態」，並指泰國僧團應引此為戒。³⁶ 若與因歷殖民統治而變得常以直接政治行動見稱的斯里蘭卡和緬甸僧團相比，為著抗共而形成軍事威權政體的國家如泰國和臺灣等，其佛教對越僧抗爭事件更傾向作破壞官民團結，是在扯抗共後腿之政治解讀。

1960 年代香港佛聯會的刊物《香港佛教》也在第 38-41 期（1963 年 7-10 月），在近半年內，連續多期回應越僧自焚事件，其中第 39 期還是越僧事件專輯。³⁷ 戰後香港的外省僧人本來就是因避秦，才在 1949 年前後來到香港這個人生路不熟，語言不通的殖民地，所以他們每多是抗拒共產黨的，而且當中不少僧人在政治上是親臺北國民政府，並與臺北中國佛教會互動密切。但儘管如是，無論《香港佛教》在宗教平等上對南越政府有不滿，都謹慎地避免過度捲進親美或反美的冷戰政治立場爭論，試圖在政治上維持較含蓄的姿態。

單純從用詞已經看到中共是要將南越阮氏政權和美國綑綁為一起，以示這遠不只是吳氏宗教壓迫的個別濫權事件，卻是美方指使下與之合作的共謀。雖然此一指控在今天難與當代知道的情況相符，因為無論從美國後來在政治上對阮氏政權的處理，還是當時美國以泰國僧團為主要

³⁶ Eugene Ford, *Cold War Monks: Buddhism and America's Secre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70-178.

³⁷ 《香港佛教》第 38-41 期，分別是第 38 期（香港佛教雜誌社，1963 年 7 月），頁 3-9；第 39 期（1963 年 8 月），頁 1-16；第 40 期（1963 年 9 月），頁 40-41；第 41 期（1963 年 10 月），頁 3-4，35-37。

著力點的東南亞佛教政策，皆難以支持壓迫越南佛教是美方指使，南越執行的合謀政策。《彙編》所述中共佛教對越僧抗爭事件所作的冷戰政治解讀，與《香港佛教》的謹慎迴避政治論斷之間差異明顯，反而與白聖日記的另一種政治解讀之間，形成相反但相成的「共鳴」，即雙方從相反的政治立場皆認定越僧的抗爭是政治行為，即反殖反帝和破壞抗共團結，而不只是單純宗教平權之訴求。

第八，在佛教思想方面，《彙編》特別引述並提到中共建政後，其佛教相關學術部份似乎尤為注意與重視佛教因明，所謂因明（*hetu-vidya*），³⁸ 乃佛教思想中對推理及其標準與條件等之討論。中共學界自 1950 年代始確對因明相對有所重視，但《彙編》沒有作出解釋，這不應被誤解為中共尊重或重視佛教思想。正好與此相反，中共學界對因明的「重視」，正是源於其對宗教思想的敵意，認為應該將宗教思想中偶存的理性成份與前者作完整的切割，因此在中國的因明學界成員，常有生疏於佛教哲學或其宗教思想，背後的理由正是為著最終目標是消除宗教及其思想，但在此之前要作「去蕪存菁」之程序，即「萃取宗教糠糟的理性內核」，所以中國學界才會出現研究因明卻陌生於佛義的獨特現象。這不單反映在其研究論著的觀點內，更長期反映在中共的知識劃分和學科的級別制度內。在中國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因明學人多有執教於邏輯研究所，而不是宗教學的系所。

第九，佛學思想批判（頁 392-418）。這節由兩個部份組成，頁 392-402 是佛教學者呂澂（1896-1989）的引文，頁 402-418 是《彙編》主編對呂氏觀點的回應。雖然主編說明只佔《彙編》全書總篇幅的 11%，且大部份情況下皆只是篇章的「串場」，但主編在「佛學思想批判」一

³⁸ 《彙編》，頁 361-362。

節卻罕見地作出長篇議論。呂澂在 1962 年指印度佛教思想原具的樸素唯物論傾向，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逐漸走向唯心論，所以與社會失去關連，並舉部派佛教阿毘達磨和大乘識論中「轉依」(āśraya-parāvṛtti)等教理概念為例作說明以支持其立論。³⁹《彙編》的主編隨之用上約一萬字作反駁，指印度與中國佛學之區分是錯誤的論旨，目的只在為呂氏推動佛學的「唯物論化」和「階級鬥爭化」作預備。⁴⁰純從佛學研究的角度來說，持批評觀點的主編顯然並沒有正視呂澂區分中、印佛學的立論，其實是上承自乃師歐陽竟無在民國時期已有的觀點。此外從當年中共治下的政治意識形態環境來說，呂氏的立論是有借助馬克思語言，透過否定佛學的部份案例，來為其他案例在狹窄的意識形態環境中，謀取佛學討論的卑微空間之策略考慮；同時反過來說，呂氏亦企圖借助馬克思語言在現代脈絡重新闡析佛教的人世向度。如果以當年中共的意識形態用語來說，呂氏是冒著政治危險，以「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在馬列主義淹沒一切的處境下，委曲求全地維護著佛學研究之安全空間。

然而從文化冷戰的意識形態角度，《彙編》的主編對呂氏所作近乎合謀共犯 (collaborator) 之指摘，似乎沒有正視呂氏立論所身處的艱難環境。此外，主編的拒絕呂氏所作中、印佛學的區分。這到底是源於純粹在對佛學的理解上不同意中、印佛學之間存在學理內在特質上的重要差異，或是源自東亞冷戰環境下，因反共而產生的中國文化本位主義，⁴¹ 而帶有某種文化民族主義角度的批判，⁴² 還是進一步的其他原

³⁹ 《彙編》，頁 398-399，417。

⁴⁰ 《彙編》，頁 416-418。

⁴¹ 《彙編》，頁 397-402。

⁴² 《彙編》，頁 407-413。

因，由於主編身份無法完全確認（下文會作出推證），所以亦難以武斷地作確切無疑的認定。

綜合上述要點來說，由佛聯會與僧伽會這兩個戰後香港具代表性的佛教組織出面編刊並作〈序〉的資料集《彙編》，清楚表達他們作為佛教徒和宗教領袖，在 1960 年代末冷戰高峰期對中共的政治立場。當時無論佛聯會或僧伽會的骨幹成員多為 1949 年前後來港的外省僧人，這些「南來僧人」以東北和江浙籍為主，普遍不陌生於中共在 1950 年代初以「土地改革」等種種名義的政治整肅對佛教及其他宗教的迫害。⁴³

三、蕭輝楷先生：《彙編》隱姓埋名半世紀的匿名主編考

前節是對《彙編》內容的基本課題、結構及意識形態立場的說明，問題是篇幅如此巨大的資料集其關鍵的角色卻是缺席，它沒有提及誰是主編，主編到底是個人或集體皆沒有交代，也沒有說原因。《彙編》從資料的搜集、取捨、主題分類、編排、大小主題說明，到深入個別議題作討論等，都不會自動合成，每一步皆經過抉擇，並各有理據。當中多涉佛教教理、文化歷史及西方哲學（尤其馬克思主義）等的正反論辯，即使博通文史哲的學者，但若非佛教研究的行家恐難勝任。則無論《彙編》主編是個人或集體似不應匿名。

據《彙編》內容的特質，有能力擔任其主編者需要符合以下多個條件：一，熟練理解與使用中文；二，熟悉佛教，尤其漢傳佛教的教理、

⁴³ 對 1949 年避秦逃港的外省籍「南來僧人」的說明，可見侯坤宏著，《論近代香港佛教》（陳劍煌編，《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1 年 2 月）第二章，頁 35-117；亦可見鄧家宙著，《香港佛教史》，香港：中華書局，2015 年 6 月，頁 92-122。

歷史及文化，但不一定是佛教徒；三，對西方哲學，尤其馬克思主義有基本認識；四，對中共的意識形態，特別其宗教觀、政策，及制度皆有相當認識；五，《彙編》出版於冷戰階段的 1968 年，編者在政治立場上是持「抗共」態度；六，編者在 1968 年《彙編》出版前後，應該是長期在香港生活與工作。芮哲（Justin Ritzinger）近聲稱，據專研現代中國佛教的美籍學者尉遲酣（Holmes Welch, 1924-1981）⁴⁴ 的信件，可知尉遲酣在《彙編》籌劃和顧問過程中的某些步驟也許有特殊角色，尉遲酣甚至曾考慮將《彙編》全文英譯，但由於不明原因最終沒有成事，⁴⁵《彙編》在當年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問題是：尉遲酣雖通中文，尉遲酣也許與其中部份前述條件相符，但不可能全部符合，當時他另有工作，似難全心力投注《彙編》，《彙編》的編輯應另有其人。

本節是說明這位隱姓埋名半世紀的匿名主編之身份，在此先破題指出他是蕭輝楷先生，他在不同的文字工作和階段使用不同筆名，已知的有陳虹、方皞、魯明、程庶、蔡提摩太（編譯時用）等，但亦有不少以本名執筆。迄今直接指蕭先生是《彙編》主編之公開資料非常有限，其中一項是維基百科「蕭輝楷」條，⁴⁶ 但沒有說明出處。中國的百度搜索

⁴⁴ 美國學者尉遲酣（Holmes Welch）藉著他曾任美國國務院駐港情報官的特殊工作身份之便，訪問 1949 年避秦散落在香港，乃至後來遷往臺灣、星馬、泰緬及菲律賓等地的流亡僧侶，並以此口述記錄為主要基本資料之一，在 1960 年代撰寫他的現代漢傳佛教三部曲，當中的《中國佛教的實踐 1900-1959》（*The Practices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9*）和《毛澤東治下的佛教》（*Buddhism under Mao*）皆運用上述主要涉及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早期的材料。

⁴⁵ Justin Ritzinger, “Tinker, Tailor, Scholar, Spy: Holmes Welch, Buddhism, and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Vol.22 No.2, 2021, pp. 421-441.

⁴⁶ 維基百科的「蕭輝楷」條，2023 年 10 月 1 日 18:34 的版本，<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5%AD%E8%BC%9D%E6%A5%B7>。

有「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條，卻沒有提及誰是《彙編》主編。連蕭先生家屬在臉書（facebook）上設立名為「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的公開帳戶亦沒有提及蕭氏乃《彙編》主編一事。

在此據散落在不同材料的文字與記述，以時序為主軸扼要說明蕭氏的生平，尤其 1950-1990 年代初的四十餘年之間，他在中國大陸、臺灣、日本及香港的知識、教育、傳媒、出版及佛教等領域的活動。並據其生平、時序、活動及人脈，論證他是《彙編》主編的唯一人選，在《彙編》成刊出版上扮演真正關鍵角色。蕭氏是一位多才多藝，且多產的南來文人，但在此的焦點是蕭氏與《彙編》、佛學及香港佛教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在其他領域的貢獻，除非間接有助於理解他與佛教的關係，否則在分析的詳略之間作酌情安排。

由於蕭氏並非如新儒家唐、牟等體制內學者，雖然撰述甚豐但多不屬狹義的學術書寫，目前提及蕭氏的論著多屬以下範疇：一，1950 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⁴⁷ 文化冷戰及友聯社；二，戰後迄 1980 年代香港右

⁴⁷ 「第三勢力」是指 1949 年中國政權易手後，流落香港的前國府官員、政黨政客、軍官、地方勢力領袖、情報人員等，共通的立場是「反共非蔣」和接受美方資助，聲稱伺機反攻中國，主要活躍於 1950 年代的香港，然最終只是一盤散沙和動機龐雜的烏合之眾，一事無成後在 1950 年代後期作鳥獸散，但其政治之外派生的文教暨學術運動則意義更為深廣久遠。有關「第三勢力」的中文論著，見柴宇瀚著，《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臺北：一八四一出版社，2024 年 4 月），第一、二章，即頁 18-170；陳正茂著，《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冷戰時代滯港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臺北：元華文創，2021 年 12 月）全書，以關鍵人物為線索所作的論述；陳正茂著，《文化資產、第三勢力及政治人物：陳正茂教授杏壇筆耕集》（臺北：秀威資訊，2019 年 1 月），〈中篇：第三勢力〉專題，頁 116-220；萬麗鵬著，《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0 年）；英文專著有 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派知識、文教藝術暨傳媒圈子；及三，戰後香港佛教圈。在此先以順時序列出蕭氏生平，主要參考臉書「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帳戶、維基百科「蕭輝楷」條，及徐東濱撰〈悼念輝楷〉，再輔以蕭氏報刊上的已知文字、同代人對他之描述，及港、臺文化、佛教及知識界的評論。

蕭氏的人生據其活動性質和地點可依時序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 1926-1949 年，出生與成長於中國，抗戰期間參軍和戰後求學。其次是 1949-1957 年間在臺、日求學和工作；之後是 1957-1992 年之間定居香港迄辭世，從事文教、出版及編譯工作。這包括蕭氏在 1957 年（31 歲）完成日本修業赴港定居與工作之前，在重慶、昆明、北平三地求學，當中夾雜軍旅歲月，並稍後在臺、日升學。其次是蕭氏學成從日本赴港定居，開始其文教、傳媒、編輯及出版等事業。此外亦說明蕭氏與冷戰時期香港社會的「右派」群體和香港佛教之間的知識和價值關係。

輾轉求學：蕭輝楷（Hwi-Kai Hsiao, 1926-1992 年），蕭氏 1926 年 5 月 15 日出生，四川省宜賓人。據友聯社創辦人徐東濱（1927-1995）⁴⁸ 在 1992 年撰〈悼念輝楷〉稱，蕭氏在 1941 年（15 歲）於重慶南開國中升讀高中，學業成績常為全級之冠。1944 年（18 歲）蕭氏考入昆明國立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exington Books 2018)；Kenneth Kai-Chung Yung (容啓聰), *Chines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Quest for Liberal Values in the Cold War, 1949-1969* (Series of 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 Vol. 25, Brill Publisher 2021)；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對「第三勢力」的評價，見李潔明（James R. Lilley）著，李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臺北：時報文化，2003 年 4 月），頁 60，106。

⁴⁸ 見盧瑋鑾、熊志琴合編，《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7 月，頁 167-170；又見王劍叢編寫，《香港作家傳略》，西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7 月，頁 171。

西南聯合大學修讀哲學和心理學，⁴⁹ 開學未及三個月，應國府號召投筆從戎。由於軍事委員會外事局急需譯員，協助中國遠征軍和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 1893-1958）將軍的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蕭氏遂考入外事局譯員訓練班，在 1945 年 1 月（19 歲）以少校階任三級翻譯官，派駐雲南呈貢機場擔任中美軍隊聯合作戰的翻譯官。在戰火下蕭氏撰三詩記其軍情緊心緒，當時實齡 18 歲 4 個月。⁵⁰

抗戰勝利後，蕭氏退役返鄉省親與休整後再入讀北大哲學系，師從賀麟習西方哲學。未幾 1949 年 10 月中國政權易手，中共建政。蕭氏在同年 12 月（23 歲）經香港在 1950 年 2 月赴臺灣大學哲學升學，從學於方東美等，1951 年以〈大乘佛學範疇論〉為題完成論文畢業。畢業後曾在 1951 年（25 歲）任教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後來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擔任初 32 班導師兼編輯組長，並任「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⁵¹ 戰工隊設計委員。附中期間蕭氏與郭成櫟合作填詞完成師大附中校歌，⁵² 曲與詞皆唱頌至今。

⁴⁹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是抗戰時由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的大學。

⁵⁰ 徐東濱著，〈悼念輝楷〉，文壇人物《香港筆薈》第二期，1994 年 1 月，頁 78。徐東濱特別記下蕭氏戰時任譯官之際所撰三詩，今轉錄於此：一，東風吹海卷腥來，湘水衡城迄灑開，將軍斬語劍深埋，志士慟聞甌益破，西流落照盈天血，北潰王師遍野骸，垂危十萬良家子，忍聽先靈泣九垓。二，尋章擇句老雕蟲，駿馬秋風夢幾重，壁劍欲吟悲左袂，征鞍未據媿前雄，纔聞鐵騎摧黔邑，已見銅駝泣晉宮，天降虹霓招我命，神歸宇宙氣還穹。三，淒涼搜篋理吟箋，敝帚還珍劇可憐，天外流光歸一瞬，人寰幻像了千年，浮生但賴瑩生寄，夢憶還從知友傳，棄骨蠻荒何處塚，鄉關北望意茫然。

⁵¹ 「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前身，「反共抗俄聯合會」成立於 1950 年 4 月，由各學校及各職業團體青年共同成立，指導單位包括國防部總政治部、省黨部。1952 年 10 月改名為「中國青年反共

1950 年冬，總統府戰略顧問何應欽（1890-1987）訪日，日本佛教白蓮社主大西一政提供三個留學名額予在臺學生赴日研習佛教，⁵³ 何應欽將此事向內政部報告，由在臺北復會的原中國佛教會時任秘書長的南亭法師（1920-1982）等代為挑選人選。⁵⁴ 同年 9 月 5 日何氏在總統府負責教育事務的張其昀和情報事務的唐縱二位顧問共同呈報蔣介石作「總裁批簽」。⁵⁵ 蕭氏成為三位獲獎人之一赴日深造佛教，同屆獲獎的另外二人是圓明法師和李瑞爽（1931 出生），⁵⁶ 蕭李二氏赴東京大學，

救國團」，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和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到 1970 年，救國團解除與國防部的隸屬關係，改為內政部登記的社會機構。

⁵² 〈師大附中校歌〉歌詞（填詞人蕭輝楷）：「附中，附中，我們的搖籃，漫天烽火創建在臺灣，玉山給我們靈秀雄奇，東海使我們闊大開展，我們來自四方，融匯了各地的優點，我們親愛精誠，師生結成了一片，砥礪學行，鍛鍊體魄，我們是新中國的中堅，看我們附中培育的英才，肩負起時代的重擔，附中青年絕不怕艱難，復興中華相期在明天，把附中精神，照耀祖國的錦繡河山。」網上有多个不同的演奏與合唱的版本：國立臺灣師大附中校歌 MV（合唱版）- YouTube，師大附中校歌 HSNU 師大附中音樂班 40 班慶音樂會，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3VJmJzmk8bY>。

⁵³ 張鐵君著，〈三民主義與新佛教的建設：送別蕭輝楷、李瑞爽兩居士釋圓明赴日贈言〉，《人生》第 3 卷第 9 期，1951 年 10 月 25 日，頁 5。

⁵⁴ 釋南亭著，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南亭和尚自傳》，1994 年 5 月初版，頁 157。

⁵⁵ 「呈文」1951 年 9 月 5 日，檔案編號：〈台（40）改秘室字第 0394 號張其昀、唐縱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檔號總裁批簽 40/0312，收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政黨持有政治檔案清冊》（第二階段），頁 30，447 項。

⁵⁶ 李瑞爽（Francis R. Lee 1931 出生），吉林省吉林人，臺灣師範大學、日本國立東京大學畢業習印度哲學及中觀佛學，並獲美國哈佛、加州二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麻省大學、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等校教授，以研究中國禪宗演變和寺院戒制，1980 年代數度在臺灣參加會議與講學

圓明考入東京駒澤佛教大學。這次日本佛教的留學獎學金有兩層意義：首先，從隨國府遷臺的中國佛教僧侶之角度來說，要在臺灣「復興」佛教，首要有僧侶教育來培養僧材，有志於學的佛教年輕僧、俗學人都指望留學，當時臺灣僧、俗留學習佛教均需政府許可，蕭氏在 1952 年赴日就是國府遷臺後首批出國習佛教的學生。當時的推薦機構是臺北準官方的中國佛教會，⁵⁷ 雖然挑選在初期因未及充份制度化而招來爭議，⁵⁸ 但對戰後臺灣佛教而言，這一屆留學生的意義是開戰後臺灣佛教留學的先河，尤其赴日本與泰國。⁵⁹ 本身也是留日的聖嚴法師在 1967 年提到：「去日本留學……從 1952 年以來，由臺灣去的僧尼居士，已有圓明、蕭輝楷……二十位左右」。⁶⁰

當時兵馬倥傯，宗教組織作為社會重要一員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故官、民或調政、教雙方對此皆有一定共識。所以當總統府顧問張、唐二氏向蔣介石上報蕭氏等獲獎學金，正在做出國預備時，特別提到「除辦理出國手續……外，刻正施以短期政治訓練……以國民外交方式促進民間合作」。⁶¹ 負責挑選留學生的中佛會南亭法師也對開留學日本

等。

⁵⁷ 聖嚴著，《聖嚴法師學思歷程》，臺北：正中書局，1997 年 1 月，頁 93；並參許育銘著，〈民國以來留日學僧的歷史軌跡與聖嚴法師東渡留學〉，《東華人文學報》6 期，2004 年 7 月，頁 197。

⁵⁸ 星雲在 1964 年提及：「中國佛教會從來沒有因留學僧而舉行過考試……這都是當初主持佛教會的諸公，憑個人所知所愛，臨時拉去湊數」，見釋星雲，〈留學僧〉，《覺世》1964 年 8 月。

⁵⁹ 留學泰國的見釋淨海著，《佛國留學紀實》（《智慧人系列》，臺北：法鼓文化，2015 年 7 月），但他後來有再轉學日本。

⁶⁰ 釋聖嚴著，〈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學術研究》，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法鼓全集第 3 輯第 1 冊，頁 281。

⁶¹ 檔案編號：台（40）改秘室字第 0394 號，收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

習佛教有其由宗教伸延出來的政治見解「一國……不僅要注重團結內部……且要注意爭取國際同情。特別是佛教，它的教義與宗旨是世界性，不屬於哪一國、族所有的。所以自由中國佛教必須嚴密注意國際佛教聯繫。六年來自由中國佛教對國際佛教聯繫是怎樣？戰後……兩國佛教徒都有共同理想，以謀……兩國切實合作」。⁶²

這段引文的確切含義其實隱藏在婉轉與含蓄的字裡行間，兩岸佛教之間無論是國際佛教組織的交往或在日本侵華之後與日本佛教之間的互動，都在進行劇烈的外交角力。⁶³世界佛教徒友誼會（World Fellowship

政黨持有政治檔案清冊》（第二階段），頁 30，447 項。

⁶² 釋南亭著，《南亭和尚全集（十）：世學類：教育評論（一）》，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編纂，臺北：華嚴蓮社出版，1990 年 3 月，電子版，頁 244-245。

⁶³ 釋學愚著，《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八章〈中國佛教協會〉，頁 435-486；第九章〈佛教外交與政治宣傳〉，頁 487-606。侯坤宏著，《論戰後臺灣佛教》第三章（新北市：博揚，2019 年，頁 91-176）、十四章（頁 493-546）。香港佛教聯合會等編，《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香港：友聯社，1968 年）第一部第一章〈關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說明〉（頁 3-33）；第三部〈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二章（頁 119-128）；第四部第二章〈特殊宗教活動〉（頁 214-256）、第三章〈對外聯繫宣傳活動〉（頁 257-327）；附錄一〈中共佛教工作面面觀〉，附錄頁 1-14。闕正宗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揚文化，2014 年 6 月）〈後篇〉第一章〈冷戰時期中佛會對東南亞的宗教外交：以世界佛教友誼會、世界佛教僧伽會及世界佛教華僧會為中心〉，頁 257-300。蘇全正、楊書濠編纂，《臺灣佛教通史》，第五卷「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開展」，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2022 年 6 月，頁 245-383。楊書濠著，第六章〈中國佛教會與國際佛教團體的成立與發展〉，頁 245-286；第七章〈中國佛教會與國際佛教的關係〉，頁 287-348。闕正宗著，第八章〈中國佛教會與兩岸佛教的交流〉，頁 349-383。楊書濠著，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編審，《從戒嚴

of Buddhists) 的競爭貫穿整個 1950 年代到 1966 年中共鎖國才暫告一段落。兩岸與日本佛教之間的關係導致戰後日本佛教在對「華」的佛教互動上，分別形成親北京（中共）和親臺北（國府）而各行其事的半分裂狀態。在這時代背景下，無論是中國佛教會或臺北官方，均對佛教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及其獲獎者個人皆有兼具宗教、教育及政治意義的預期。蕭氏在 1952-1957 年（26-31 歲）的五年間，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大學院印度哲學科研究所，隨著名佛學教授結城令聞（1902-1992）⁶⁴ 專攻佛教唯識、華嚴二宗的思想，直到 1957 年結束在日本的留學與修業，⁶⁵

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 年 8 月；第六章〈中國佛教會的護國與衛教〉第一、二節，頁 229-260。額賀章友著，劉建譯，《中日佛教交流史：戰後五十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5 月。E. Ford, *Cold War Monks* 散見全書多處，尤其頁 152-169, 179-193, 220-223, 284-286。此外，臺北中國佛教會前會長白聖長老的廿餘冊日記零散但廣泛地保留了中佛會代表參加歷屆會議之經歷的記錄。

⁶⁴ 結城令聞（Reimon Yuki, 1902-1992），日本的著名佛教學者，兵庫縣人，生於淨土真宗寺院本願寺派的家庭，1927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1949 年研究世親唯識思想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1960 年擔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暨名譽教授，1963 年在東京大學退休，此後擔任京都女子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華梵唯識文本、華嚴宗，及日本淨土真宗的思想，代表作依時序有《心意識論より見たる唯識思想史》（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5 年）、《世親唯識の研究》上冊（兵庫縣：青山書院，1956 年 1 月，二冊本由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重刊於東京大藏出版社，1986 年）、《唯識学典籍志》（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藏出版社，1962 年）、《唯識の思想と歴史》（大法輪閣，1992 年 8 月）、《唯識三十頌》新裝版（佛典講座，大藏出版，2001 年）等著作多種。

⁶⁵ 筆者曾在 2021 年 9 月 20 至 24 日間的系列電郵，誠請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求學時的學弟，現東京大學張政遠教授在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轄下的印度哲學研究室和大學院（即研究院）兩個部門的記錄中查核蕭先生

到香港定居。選擇赴港這有私與公兩個原因，蕭氏的好友徐東濱創立了在 1950-1960 年代香港知識與文化界非常活躍與多產的香港友聯社，蕭氏留日期間就已掛職友聯社東京特約海外編輯，徐氏邀他修業完畢回港就職友聯社，有私誼相熟的學友一起在講粵語為主的異鄉共同工作，這是值得開展的決定。此外，也許還應與他從臺灣到日本留學之前，沒有嚴格規定學成之後必須歸國服務條件有關，這與後來之規定不同。⁶⁶

蕭氏赴港定居與工作（1957-1992）：蕭氏 1957 年自日本赴港後定居香港迄 1992 年（66 歲）逝世，前後凡 35 年，這亦是蕭氏對當時香港社會與文化貢獻最活躍的階段。蕭氏返港後 1957-1959 年間在友聯社任職總編輯和友聯圖書編譯所長。1950 年代學成後的文藝暨散文作品散見臺、港多種刊物，並在香港多種報刊任報刊和叢書編輯、書報翻譯、報刊主筆及顧問等職。蕭氏自 1968 年始在港從事文、史、哲方面的大專教育，⁶⁷ 執教於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等多所大專院校，並兼行政職務。

1950 年代的求學記錄，張教授在 9 月 22 和 24 日的覆郵中確認蕭先生是在昭和二十七年（1952 年）四月入讀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科，昭和三十三年（1957 年）三月退學，但據張教授解釋，由於東京大學只收藏畢業生的博士論文，沒有收藏碩士論文，因此找不到蕭先生的畢業論文，所以不完全確定他是研究院肄業還是碩士畢業，但無疑問他曾在東大的印度哲學科求學。在此特別感謝張教授及他在東大的同事幫忙核實蕭先生的資料。

⁶⁶ 這一點感謝審評人 B 的提醒。

⁶⁷ 所謂「大專教育」或「專上教育」，這在 1960-1990 年代的香港教育界是個專有名詞，指在當時官方正式承認並授予學位的大學以外，提供高中以上的學院系統教育，比之於大學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大專院校多以華文授課，這類院校的校舍與收生規模差異甚大，且當時在政治上多仍效忠臺灣國府，有在臺灣教育部註冊。據香港制度，此類院校不能提供學位課程，其畢業證書不能稱為學位（degree），只能稱為文憑（certificate），但在當年香港高等教育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需求甚大，現除極少數升格為私立大學或轉售外，

蕭氏亦活躍於文化界，曾在 1972 年香港海鷗劇團導師改編話劇「少年維特之煩惱」，⁶⁸ 廣獲好評，並在 1979-1986 年間數度擔任香港市政局圖書館、浸會學院中文學會等主辦文學比賽的評審委員，並在 1987-1989 年間二度赴臺參加臺大等校哲學系的研討會撰文探討儒家與康德哲學。蕭輝楷的文字主題甚廣，涉及傳統中國文哲、現代文學、文藝批評、政治社會時事、西方哲學、佛教思想等；其文字所涉文體亦甚多樣，從雜文隨筆、散文、詩詞、歌詞、譯作、小說、劇本、評論文到學術論文皆有。

蕭氏也譯有以阿勃拉姆·特爾茨（Abram Tertz）為筆名的俄羅斯作家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的反共小說《刑網》（*The Trial Begins*，友聯出版社 1961 年）⁶⁹ 和亞瑟·伊曼紐·赫茨勒醫生（Arthur E. Hertzler, M.D.）《杏林記趣》（*The Horse and Buggy Doctor*）等小說。⁷⁰ 蕭氏尚撰有未刊書稿《毛澤東思想析論》約廿萬言探討其《實踐論》和《矛盾論》。遺憾的是蕭氏離世突然，未及親身整理與匯集其文字付梓。近年蕭氏家人整理其遺留的文字，並分門別類按主題在香港

多已解散。見周正偉著，《中國變局與香港專上教育》，臺灣：政大出版社，2020 年 7 月，頁 131-216，253-312。

⁶⁸ Shelby Kar-yan Chan (陳嘉恩), *Homeless at Home: Identity and Theatre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h.D. Thesi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2011, p.317.

⁶⁹ 阿勃拉姆·特爾茨（Abram Tertz）著，方皞（蕭輝楷）譯，《刑網》（*The Trial Begins*），香港：友聯出版社，1961 年。

⁷⁰ 亞瑟·伊曼紐·赫茨勒醫生（Arthur E. Hertzler, M.D. 1870-1946）著，方皞（蕭輝楷）譯，《杏林記趣》（*The Horse and Buggy Doctor*），香港：今日世界社，1963 年。

出版，目前已刊的有《哲學問題論集》⁷¹ 和《蕭輝楷文學評論集》⁷² 兩種論集。

蕭輝楷先生長期活躍於冷戰時期香港的右派文教、傳媒及知識界，⁷³ 右派除了指狹義上效忠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兩蔣時期及戒嚴狀態下的黨國體制，也指廣義上認同中華民國法統及其憲政體制，但不認同甚至反對蔣氏的專制和國民黨的軍事獨裁與威權政體。而蕭氏及與他關係密切的友聯社 1950-1960 年代外省知識群體⁷⁴（即「南來文人」）和背後主張「反共非蔣」的第三勢力均算是廣義的右派。

中共在 1956 年展開「鳴放運動」，並借此向在港知識份子和海外華人進行統戰，一度說服部份已落腳香港的第三勢力知識人返回。仍然留在港的第三勢力圈子為因應此，認為不分黨派的反共人士需要聯合在臺民主派如雷震（1897-1979）等組成聯盟作出制衡，於是在港第三勢力

⁷¹ 蕭輝楷著，《哲學問題論集》（香港：初文出版社，2021 年 9 月初版），當中收錄的即多有原在 1984-1985 年間，刊於《能仁學報》22，29 期等，分別討論康德、黑格爾、柏格森及儒家思想的文章。

⁷² 蕭輝楷著，《蕭輝楷文學評論集》（香港：初文出版社，2023 年 5 月初版），當中收錄的均為蕭氏討論傳統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文字。

⁷³ 在戰後香港的社會脈絡，對於由國、共兩黨伸延為兩岸的政治對峙，有所謂左派與右派之分，左派指政治立場上是親共產中國的北京，右派指親臺北國府。

⁷⁴ 友聯社在 1960 年代末期逐漸進入世代交替，其年輕成員多為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操粵語，淡出甚至抗拒中華民國認同，更關注香港本土社會議題，政治價值觀上既有更傾向西方，卻也偶爾有個別例子反而傾向共產主義和北京，其中不少人熱心於戰後西方社會的流行文化，而不是傳統中國文化，甚至成為 1970 年代香港引入西方流行文化的先驅，見盧瑋鑾、熊志琴合編，《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二冊（2017 年 1 月）頁 68-77，187-193 等全書多處。

各黨派代表共 14 人透過座談會，在 1958 年春天組成「中國民主反共聯盟」，並在 1958 年 8 月 15 日通過創刊《聯合評論》週刊為聯盟的機關刊物，對鳴放運動進行反制論述，⁷⁵ 與會的 14 人之一即包括代表友聯出版社的蕭輝楷。⁷⁶ 但另一方面，友聯社群體雖然反對中共極權政體，卻也不贊成蔣介石在臺的軍事獨裁，只是在憲政原則上，仍然認同中華民國的法統，且與臺灣的自由主義派學者殷海光（1919-1969）和民主異議人士如《自由中國》的雷震等關係密切，尤其臺灣大學哲學系異議學人與香港的連繫之一，就是透過「反共非蔣」的友聯社知識群體，蕭氏與他們一直關係密切。尤其在 1959-1960 年，蔣介石堅持作第三屆總統連任，當時離散在臺、港、東南亞、日本及歐美等而仍認同中華民國法統的華人知識界公開反對蔣氏連任的涉嫌違憲，余英時在其回憶錄證實香港友聯社參與聯署的即包括蕭輝楷先生，⁷⁷ 這也許亦有助理解他在日本學成後為何是赴港而非返臺。

蕭輝楷在 1959 年為回應上述來自左、右兩方的夾擊，曾表達對時局的看法，他在當年 9 月 4 日提到今日唯一可能為中國社會所普遍接受的文化理想，是民主、是自由、是科學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良質素……任何……政治與軍事力量都不能阻遏，因為它們不能把人心真正扭轉。⁷⁸ 稍後在 12 月 11 日再提到「民主中國運動」者和政府（指臺北）當然可以團結也應該團結，政府的根本是《中華民國憲法》，而這

⁷⁵ 陳正茂，《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頁 73-74。

⁷⁶ 陳正茂，《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頁 369。

⁷⁷ 余英時著，《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2018 年 11 月，頁 145。

⁷⁸ 蕭輝楷著，〈民主中國運動是無敵的：文化理想與民主中國運動〉，《聯合評論》第 55 號（1959 年 9 月 4 日），轉引自陳正茂，《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頁 81-82，84。陳正茂，《文化資產、第三勢力及政治人物》，頁 160-161。

部憲法的主要精神，正是民主中國運動者的基本目標所在。⁷⁹ 蕭氏觀點認為，雖然反共是第三勢力的核心目標，但民主憲政也是其另一核心價值，二者並行不悖，不應該也不能夠為了反共而犧牲民主憲政。反對共產黨在中國的專制暴政；也反對國府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在臺灣進行威權統治。⁸⁰ 這一點解釋了蕭氏 1957 年結束日本修業時，為何前赴工作與定居的是香港，不是中華民國政府所在的臺灣。除了先前已提及的就業與同儕等個人理由外，還有政治立場與價值群體的考慮。

蕭氏的佛學教、研：蕭氏當年在香港的南來文人社群之間，以文教與筆耕而聞名。雖然他在佛學上的專長顯為香港佛教界知識群體所熟悉，但在香港佛教圈外甚少被提及，遠不如其文藝聞名，畢竟與社會大眾相比，佛教社群還是少眾。有時甚至連香港以外的其他漢傳佛教界，例如臺灣，亦對他甚為陌生而有所誤會。蕭氏的佛教講學集中在 1970-1980 年代，佛教知識的受業者，僧尼有暢懷法師（1929-2019 年，1970 年旁聽理則學）、永明法師（1970-1973 年曾應邀為其新亞研究所入學及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研究院入學申請擔任推薦教授）、會機法師（1970-1973 年修課）、正因法師（1970-1973 年修課）、宏勳法師（1978 年修課）、道平法師，及寬運法師（當時仍未出家，俗名「劉振奎」）等，另還有一些在家眾，部份長期活躍於香港佛教界或其主要組織。⁸¹ 在戰後香港佛教界以傳統方式弘揚玄奘唯識學數十年而聞名的

⁷⁹ 蕭輝楷著，〈論「團結」〉，《聯合評論》第 69 號（1959 年 12 月 11 日），轉引自陳正茂，《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頁 82-84；陳正茂，《文化資產、第三勢力及政治人物》，頁 162。

⁸⁰ 陳正茂，《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頁 83。

⁸¹ 據維基百科「蕭輝楷」條，除僧侶外，尚包括在家眾如何敏儀、朱雁花、劉錦生、陳麗霞、曾憲文、劉惠明、張若香、李瑞蘭、馬儀芸、黎子榮（1991-1992 年修學）。

前中山大學學者，被香港佛教圈尊稱為「羅公」的羅時憲教授即與蕭氏頗相熟。⁸²

蕭輝楷的哲學探討以西方哲學（尤其康德哲學）、大乘佛教唯識學及孔孟儒學為主，亦隱然有比較哲學之傾向。筆者甚至懷疑，蕭氏 1951 年在臺大哲學系以大乘佛教範疇論為題的學士論文，也許已經是試圖作此對比，畢竟「範疇」論正是康德知識論重要環節之一，惜臺大哲學系只藏碩、博士論文，不存學士論文，所以今似乎無從確認筆者的推測。帶著此背景，也許可有助釐清漢傳佛教界部份觀點對蕭氏的誤解。星雲法師（1927-2023）在 1964 年曾舉前述 1952 年蕭氏獲得日本佛教留學獎學金為例，表達對當時臺北中國佛教會主事者的不滿，並順帶頗苛刻地批評蕭氏，星雲說：「中國佛教會從來沒有因留學僧而舉行過考試，記得民國四十年（1951 年），何應欽將軍訪問日本之時，為我國爭取到三名留學僧的名額，中國佛教會派一位從未參加過佛教活動的蕭某到日本留學，蕭某到了日本，就否認與佛教的關係，言之殊令人痛心。這原因何在？這都是當初主持佛教會的諸公，憑個人所知所愛，臨時拉去湊數」。⁸³

星雲的不滿恐源於多層誤解：首先，星雲指摘中佛會南亭為了「臨時湊數」，把獎學金給予和佛教無關的人，但事實上蕭氏的學士畢業論

⁸² 羅時憲在《唯識方隅》第三十八講（應為 1980 年代，但具體年份及日期不詳）（粵語中文字幕版）提到，曾詢問蕭輝楷先生有否意願翻譯日本學者真野竜海著《現觀莊嚴論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2 年），羅時憲願意在教界籌款以提高稿費，據羅所稱，蕭氏沒有答應此事，當時蕭氏在親國府的《香港時報》任編輯。1:24:22 《唯識方隅》第三十八講 「羅時憲先生」講授（字幕版），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Ssm0NZRyH2Y>。

⁸³ 釋星雲著，〈留學僧〉，《覺世》，1964 年 8 月。

文是以大乘佛學範疇論為題，並非與佛教無關。其次，也許更關鍵的細節是，即使申請案是由中佛會經辦，但無論是獎學金提供者或居間參與決定派遣名單的日、臺雙方其他機構皆有各自的角色。因為另一位同屆赴日留學的是青年僧侶圓明法師，他在赴日後因故與中佛會關係變疏離而受到後者指責，曾為此撰刊公開信函作說明，當中表示中佛會在決定上並非唯一最關鍵角色，圓明說：於去年（1951 年）經「自由中國宗教聯誼會」派遣來日讀書，由日本白蓮社擔任經費。……自由中國宗教聯誼會與中國佛教會無關。惟當時介紹推薦人李子寬老居士，同為聯誼會與佛教會之負責人，故曾假此之便，以中國佛教會名義……發表；實則「自由中國宗教聯誼會」之事與中國佛教會無關。近來有人不明此中關係，似以為圓明受中國佛教會栽培，……以名分相加，老氣橫秋，則圓明殊無此責。今後類似情事，自聲明之日起，恕不受理。⁸⁴ 圓明的爭端誰是誰非姑且先不論，但起碼指出在中佛會之外或之上，顯有其他單位有權力介入留學人選之決定，尤其當年戒嚴時期，「自由中國宗教聯誼會」⁸⁵ 可能比中佛會更靠近官方，蕭氏本來就是反共立場明確，且參與籌措反共宣導事務的青年教師，因而受當時官方信任而推薦他申請獎學金，在那個年代，這其實可以理解。

再者，在現代佛教學術，研究者本來就不需要與其研究對象有個人信仰關係，有時甚至強調雙方之間的無關狀態，才更有利於客觀研

⁸⁴ 釋圓明著，〈圓明鳴謝啓事〉，《覺生》月刊，第 35 期，1952 年 5 月 1 日，頁 23。

⁸⁵ 中國宗教徒聯誼由太虛大師、天主教于斌主教、基督教陳文相牧師，及伊斯蘭教白崇禧將軍等共同創於日本侵華的 1941 年，用以聯繫世界宗教反抗暴力侵略。1950 年隨國府遷臺後，公推于斌樞機主教為理事長。

究。⁸⁶ 蕭氏在那個年代可謂因而在宗教研究之態度上，走在時代之端才能坦然作此直言，觀乎過了七十餘年的今天，以臺灣為例華人學術界的宗教或佛教研究在本質上是世俗學科，這已是今天的行內常識。⁸⁷ 星雲當時顯然陌生於現代學術規範，尤其是宗教研究的世俗特質，既錯怪南亭，更錯怪蕭氏。星雲似乎亦不知道蕭氏在日本習唯識佛學後定居香港，在 1970-1980 年代之間一直有在香港佛教的僧、俗知識界講授佛教思想。況且在星雲責備蕭氏與佛教無關之後四年，蕭氏在 1968 年即以匿名方式完成《彙編》一資料冊的匯編與出版，這很難說蕭氏與佛教無關。只是蕭氏定居香港的數十年間，除了 1950 年代後期以參與香港第三勢力聯署抗議蔣介石涉嫌違憲連任，和在事隔近三十年後的 1980 年代赴臺參加學術會議外，似乎與臺灣及其佛教界或佛教學術界並沒有多作連繫，所以星雲恐怕亦不知蕭氏的下落與行事，迄 1993 年蕭氏辭世止的近三十年間，星雲似乎並不知道此事，故亦因而沒有修正先前對蕭氏的批評。

據上述蕭氏生平事跡遂可推斷《彙編》匿名編者的真實身份。《彙編》本身沒有提及其主編，亦不清楚有否特殊原因。但從知識條件、價值觀或政治立場、工作機構，及環境因素等多個角度作考慮，在

⁸⁶ 國際學界對此一直在進行週期性的反覆檢討，對此的摘述請見劉宇光著，《僧侶與公僕：泰系上座部佛教僧團教育的現代曲折》（陳劍煌編，《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23 年 1 月），頁 32-48，不在此冗敘。

⁸⁷ 臺灣佛教學術界對現代研究規範的逐漸接受與建立是在 1990 年代間，請見劉宇光著，〈臺灣的佛教研究四十年（1980-2020）：以語言、文本及義理研究為範圍〉，耿立群主編，《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2021 年 9 月），頁 543-578，尤其頁 546-552，不在此冗敘。

1950-1960 年代的香港能夠同時符合這些因素，而能勝任《彙編》主編角色之人選可謂鳳毛麟角。如前所述，知識上熟悉中、印佛教的思想、歷史及文化；價值觀上反共但對中共的馬列主義有相當認識，並帶有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及《彙編》出版前後人在香港，並且與友聯機構關係密切。當時能完全符合這些必要條件的，恐怕只有蕭氏一人。1971 年香港出現另一份佛教雜誌《內明》，它與《香港佛教》偏重稍異，《內明》偏佛教文化，《香港佛教》偏佛教社團消息與報導。蕭氏在《內明》刊有數篇具名文章，但其主題與佛教幾乎無關，分別探討和平始於正義、⁸⁸ 對「迷信與科學的因果報應」之首度⁸⁹ 和再度討論⁹⁰、香港文學團體能仁詩會⁹¹，及中國古典詩詞的永恆和時代束縛與否⁹² 等。關鍵是 1972 年 8 月出版的《內明》第 5 期第 5 頁，蕭氏撰文討論迷信與科學，文章有編者言的段落介紹作者背景，當中直接提及蕭氏是《彙編》的編者，⁹³ 這是目前能找到的幾乎唯一直接證據，清楚表明蕭氏在《彙編》的重要角色。

此外還有數處相關資料，可以在結束本文之前作出補充，並為著把問題推上另一個更高的視野種下其伏筆。這些資料補充包括：一，亞洲

⁸⁸ 蕭輝楷著，〈和平始於正義〉，《內明》3 期，1972 年 6 月，頁 35-36。

⁸⁹ 蕭輝楷著，〈迷信與科學的因果報應（一）〉，《內明》5 期，1972 年 8 月，頁 5-8。

⁹⁰ 蕭輝楷著，〈迷信與科學的因果報應（二）〉，《內明》6 期，1972 年 9 月，頁 7-9。

⁹¹ 蕭輝楷著，〈蘭亭花甲廿七周賀與香港能仁詩會上已修禊有二十二韻〉，《內明》14 期，1973 年 5 月，頁 28。

⁹² 蕭輝楷著，〈古典論著的永恆性：與學弟某君論「中國傳統詩文是否時代束縛」書〉，《內明》2 期，1972 年 5 月，頁 31-35。

⁹³ 蕭輝楷，〈迷信與科學的因果報應（一）〉，《內明》5 期，頁 5。

基金會 (Asia Foundation) 在 1960 年代初與香港相關的資助專案名單，包括屬於香港友聯研究所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題為「共產主義下的佛教」(Buddhism Under Communism) 的研究案是直接涉當時中共治下佛教所身處與面對的政治現狀，⁹⁴ 目前尚不清楚這個計劃精確的實施年份，但對照名單上其他專案的時段，基本上是到 1960 年代的前半為止，而且也沒有具體提及對此一研究之成果的要求和預期。

但友聯機構 1950-1960 年代近廿年間有成百上千種的書籍出版，⁹⁵ 據友聯在 1971 年的《出版目錄》(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的「主題索引」(Subject Index) 當中第一類「共產中國的記錄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t China) 一欄所示，唯一以佛教為主題的出版就是 DH3 的《彙編》，⁹⁶ 所以極可能這就是友聯社向亞洲基金會申請「共產主義下的佛教」專案的資助，而 1968 年出版的《彙編》就是該專案的產出成果。更何況，在當年的友聯社群體，成員的宗教態度以中國文化論、天主教（例如燕歸來）或無神論為主，佛教的是絕無僅有唯蕭輝楷先生一人。因此這無論在時間線、主題、執行機構、宗教連繫，甚至背後的政治立場等多個方面，蕭氏皆與這些條件連貫地高度吻合。

⁹⁴ 亞洲基金會記錄「香港」(Hong Kong) 主題的編號 Thru 6/62 P170 3A5001 有「組織」(Organizations) 一欄，下有由友聯研究所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負責，題為「共產主義下的佛教」(Buddhism Under Communism) 之計劃。

⁹⁵ 友聯出版的目錄與數量，見柴宇瀚，《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頁 222-238。

⁹⁶ 見「主題索引」(Subject Index) 第一類“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t China” 一欄 DH3, in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上,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ng Kong, 1971), p.1, 又見盧瑋鑾等編，《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頁 13。

只是到此為止，如前述直接證據證明編者身份迄今只有一處，確很難說 100% 確定。但也需要給予環境旁證相當的正視，尤其關鍵是友聯社，當時友聯社內完全符合編者身份條件的人，只有蕭一人，所以憑旁證或可類比地說，編者是蕭氏的比例恐怕在 95% 以上。但友聯社與文化冷戰下的東亞佛教之間的關係，則是需要另案處理之大議題，唯有說明友聯社的來歷及更大的時代背景，才能更堅實地說明蕭氏的角色，但這需另文處理。故為慎重起見，在此只說：《彙編》編者極大可能是蕭輝楷，但尚待更多一些證據作絕對無疑證實。

四、結論：《彙編》編者之謎到山外有山的疑問

上述是對《彙編》本身內容的回顧和考據其近乎匿名的主編者的身份和生平。問題是在此所作的考據，除了揭示了編者的真實身份以外，還有什麼進一步的意義與更宏觀的重要性？這是個遠比表面上的考據來得複雜的議題，難以在本文所剩無幾的篇幅作出充份的說明。然而這當中仍然有一組對單純只是從事佛教研究的學人而言，似乎是平淡無奇不甚起眼，但實質上卻是甚為關鍵的線索。《彙編》的〈序〉特別提到《彙編》的出版與合作伙伴是香港友聯研究所（Union Research Institute），而據《彙編》出版資料公開所示，《彙編》的出版機構是友聯出版社（Union Press），承印是友聯印刷公司（Union Printing Company），主編蕭輝楷先生曾是友聯編譯所所長。扼言之，與《彙編》之出版有密切業務關係的所有機構部門與人物，皆屬 1960 年代香港的友聯社，該書出版過程的不同環節，均由「友聯」不同部門分工執行，而友聯社則是受亞洲基金會資助的機構。

對單純研究現代漢傳佛教或佛教教理的學人來說，友聯社只是個受托編印及發行《彙編》的香港出版社，亞洲基金會是個支持出版事業的

文化基金會。二者皆普通而無特別之處，頂多也會知道新儒家唐君毅的《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1958年）、牟宗三的《認識心之批判》（1956年），及勞思光的《康德知識論要義》（1957年）等書亦是由友聯出版。但對專事戰後香港、星馬及臺灣文學和電影發展進行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研究的學者來說，單是聽到「友聯」和「亞洲基金會」這兩個機構的名字，就知道這已經開啟了使問題與視野上升到另一個臺階的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其所涉問題之複雜，已遠超本文眼下主題，當中的玄機只能暫時在此賣關子，留待另文專題再議。



參考書目

一、中文著作

- 「呈文」1951年9月5日，檔案編號：〈台40〉改秘室字第0394號張其昀、唐縱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檔號總裁批簽40/0312，收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政黨持有政治檔案清冊》（第二階段），頁30，447項。
- 亞洲基金會記錄「香港」（Hong Kong）主題的編號 Thru 6/62 P170 3A5001「組織」（Organizations）欄
-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佛教僧伽聯合編，釋覺光序，《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香港：友聯出版社，1968年。
- 徐以驊等著，《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年6月。
- 侯坤宏著，《論近代香港佛教》，陳劍煌編，《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1年2月。
- 鄧家宙著，《香港佛教史》，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6月。
- 柴宇瀚著，《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臺北：一八四一出版社，2024年4月。
- 陳正茂著，《大陸邊緣的徒然掙扎：冷戰時代滯港及流亡海外的第三勢力滄桑錄》，臺北：元華文創，2021年12月。
- 陳正茂著，《文化資產、第三勢力及政治人物：陳正茂教授杏壇筆耕集》，臺北：秀威資訊，2019年1月。
- 萬麗鵑著，《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

李潔明 (James R. Lilley) 著, 李添貴譯, 《李潔明回憶錄》(*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臺北: 時報文化, 2003 年 4 月。

許育銘著, 〈民國以來留日學僧的歷史軌跡與聖嚴法師東渡留學〉, 《東華人文學報》6 期, 2004 年 7 月, 頁 197。

張鐵君著, 〈三民主義與新佛教的建設: 送別蕭輝楷、李瑞爽兩居士釋圓明赴日贈言〉, 《人生》第 3 卷第 9 期, 1951 年 10 月 25 日。

侯坤宏著, 《論戰後臺灣佛教》, 新北市: 博揚, 2019 年。

柴宇瀚著, 《左右國共大局: 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 臺北: 一八四一出版社, 2024 年 4 月。

王劍叢編寫, 《香港作家傳略》, 西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

徐東濱著, 〈悼念輝楷〉, 文壇人物《香港筆薈》第二期, 1994 年 1 月, 頁 78。

劉宇光著, 《僧侶與公僕: 泰系上座部佛教僧團教育的現代曲折》, 陳劍煌編, 《人間佛教東亞、東南亞研究叢書》,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2023 年 1 月。

劉宇光, 〈一個徘徊在中國學院佛學研究上空的幽靈〉, 趙文宗和劉宇光合編, 《現代佛教與華人社會論文集》, 香港: 紅出版-圓桌文化 2012 年 11 月, 頁 24-65。

劉宇光著, 〈臺灣的佛教研究四十年 (1980-2020): 以語言、文本及義理研究為範圍〉, 耿立群主編, 《深耕茁壯: 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 臺北: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 2021 年 9 月, 頁 543-578。

蘇全正、楊書濠編纂, 《臺灣佛教通史》, 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 2022 年 6 月, 頁 245-383。

釋白聖著, 《白聖長老日記 (一)》, 臺北: 白聖長老紀念會, 2003 年秋季。

釋白聖著，《白聖長老日記（二）》，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6 年春季。

釋白聖著，《白聖長老日記（三）》，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5 年 11 月。

釋白聖著，《白聖長老日記（四）》，臺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6 年 10 月。

釋煮雲著，《東南亞佛教見聞記》，臺北：菩提樹雜誌社，1972 年，重刊於《煮雲法師全集》，高雄：鳳山佛教蓮社，1988 年。

釋淨海著，《佛國留學紀實》，《智慧人系列》，臺北：法鼓文化，2015 年 7 月。

釋聖嚴著，《學術研究》，《法鼓全集》第 3 輯第 1 冊，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

釋聖嚴著，《聖嚴法師學思歷程》，臺北：正中書局，1997 年 1 月。

釋圓明著，〈圓明鳴謝啓事〉，《覺生》月刊，第 35 期，1952 年 5 月 1 日，頁 23。

釋星雲著，〈留學僧〉，《覺世》，1964 年 8 月。

釋南亭著，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編，《南亭和尚自傳》，1994 年 5 月初版。

釋南亭著，《南亭和尚全集（十）：世學類：教育評論（一）》，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委員會編纂，臺北：華嚴蓮社出版，1990 年 3 月，電子版。

釋學愚著，《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年。

闕正宗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揚文化，2014 年 6 月。

楊書濠著，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編審，《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臺北：中國佛教會，2010 年 8 月。

額賀章友著，劉建譯，《中日佛教交流史：戰後五十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5月。

周正偉著，《中國變局與香港專上教育》，臺灣：政大出版社，2020年7月。

蕭輝楷著，《哲學問題論集》，香港：初文出版社，2021年9月初版。

蕭輝楷著，《蕭輝楷文學評論集》，香港：初文出版社，2023年5月初版。

蕭輝楷著，〈和平始於正義〉，《內明》3期。1972年6月，頁35-36。

蕭輝楷著，〈迷信與科學的因果報應（一）〉，《內明》5期。1972年8月，頁5-8。

蕭輝楷著，〈迷信與科學的因果報應（二）〉，《內明》6期。1972年9月，頁7-9。

蕭輝楷著，〈蘭亭花甲廿七周賀與香港能仁詩會上已修潔有二十二韻〉，《內明》14期，1973年5月，頁28。

蕭輝楷著，〈民主中國運動是無敵的：文化理想與民主中國運動〉，《聯合評論》第55號，1959年9月4日。

蕭輝楷著，〈論「團結」〉，《聯合評論》第69號，1959年12月11日。

蕭輝楷著，〈古典論著的永恆性：與學弟某君論「中國傳統詩文是否時代束縛」書〉，《內明》2期，1972年5月，頁31-35。

盧瑋鑾、熊志琴合編，《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香港：三聯書店，2014年7月。

盧瑋鑾、熊志琴合編，《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二冊，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1月。

余英時著，《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2018年11月。

蕭輝楷填詞，〈師大附中校歌〉，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app=desktop&v=3VJmJzmk8bY。

潘惠蓮撰，〈蔡元培墓碑的前世今生〉，《伍仟年》，2021年12月，網址：

<https://reurl.cc/qYkxnN>。

《香港佛教》，香港佛聯會，38期（1963年7月）；第39期（1963年8月）；第40期（1963年9月）；第41期（1963年10月）。

維基百科的「蕭輝楷」條，2023年10月1日18:34的版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5%AD%E8%BC%9D%E6%A5%B7>。

羅時憲講授，《唯識方隅》第三十八講（粵語中文字幕版），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Ssm0NZRyH2Y>。

二、西文著作

Shelby Kar-yan Chan (陳嘉恩), *Homeless at Home: Identity and Theatre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h.D. Thesi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2011.

Eugene Ford, *Cold War Monks: Buddhism and America's Secre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exington Books, 2018.

Justin Ritzinger, “Tinker, Tailor, Scholar, Spy: Holmes Welch, Buddhism, and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Vol.22 No.2, 2021, pp. 421-441.

Kenneth Kai-Chung Yung (容啓聰), *Chines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Quest for Liberal Values in the Cold War 1949-1969*, Series of 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 Vol. 25, Brill Publisher, 2021.

蕭輝楷先生照片說明



1951年11月2日蕭輝楷赴日深造前是師大附中的班導師，與學生合照。
(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蕭輝楷在美國《時代生活叢書》(*Time Life Book*)任副編輯，翻譯英文叢書。(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歌，史惟亮作曲，蕭輝楷等填詞。



1957 年 12 月 17 日旅港國立北京大學同學會，後排左二是蕭輝楷。
(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1963 年香港友聯機構轄下的《中國學生周報》編輯王碩儒移民，友聯成員到啓德機場送機，右十是蕭輝楷。照片的詳細說明見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一，香港：三聯出版社，2014 年 7 月，頁 217。



左一是徐東濱，右一是陳特，右二是司馬長風，右三是蕭輝楷。其中陳特先生是筆者 1995-1996 年間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就讀哲學碩士的其中一位論文導師。（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左前一為陳特，左三為蕭輝楷，左四為李璜，右前二為司馬長風，右四為唐君毅，可見當時第三勢力、友聯研究所，及新儒家或辦亞研究所之間關係之密切。（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蕭輝楷在美國新聞署出版的《時代生活叢書》（*Time Life Book*）擔任副主編。中間是蕭輝楷，左一為總編輯徐東濱，右一和右三都是助手。（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右一是蕭輝楷，他身旁戴眼鏡的是名作家司馬長風，即胡欣平，這是攝於 1980 年代。(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蕭輝楷在 1940 年代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求學時曾是賀麟教授的學生，1980 年代中國大陸相對開放，學者有更多外訪，蕭輝楷和夫人蔡慧冰女士與賀麟教授伉儷攝於蕭府。(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旅港國立北京大學同學會在 1960 年代拜祭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
北大校長蔡元培，前排左三是蕭輝楷先生。
(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旅港國立北京大學同學會每年都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拜祭北大校長
蔡元培，左二是蕭輝楷先生。(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1988年10月25日，蔡元培120周年冥誕，蔡元培子女（左三及四）來港出席，在蔡墓前與三名北大同學會成員合照。右一：徐東濱、左一：蕭輝楷、左二：林如桐。（出自潘惠蓮撰，〈蔡元培墓碑的前世今生〉，《伍仟年》，2021年12月，網址：<https://reurl.cc/qYkx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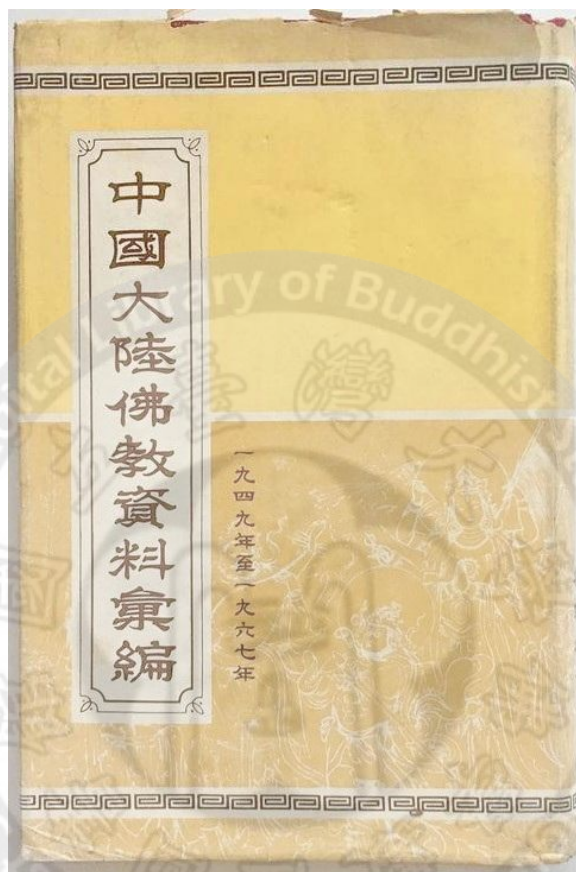
蕭輝楷和陳特。（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蕭輝楷教授與蔡慧冰小姐的結婚照。
(來自 Facebook「蕭輝楷教授文章專輯」)



蕭輝楷先生晚年。



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合編《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香港：友聯出版社，1968年。